



往事钩沉

# 我们当年的文学梦

金 夷

古城旧事

## 做筷子

王建章

上世纪60年代初物资匮乏，我家经济条件更差，全家9口人只有父亲上班，收入不多，能省则省。1962年夏由于家庭人口增多，需要补充筷子，一天母亲和父亲说了此事，父亲想了想说：“不用买了，咱们动手做吧，我找竹子，等星期天就做筷子。”

星期天早饭后，父亲便开始动手，他把找来的竹片放在炕上，用尺子量了长度，81厘米。每隔25厘米，就用铅笔在竹片上画一条线，共画了三条。我问：“爹，筷子为啥是25厘米长？”爹答：“筷子长七寸六，约等于25厘米，七寸六代表人的七情六欲；筷子的一头方一头圆，方代表天，圆代表地。”“想不到小小的筷子竟有这么多学问！”我吃惊地说。爹又说：“生活处处有学问，只要你平常有心，就会学到很多知识。”

爹让我搬来凳子，他把竹片放在上面，用左脚踩住，右手拿起锯子锯竹片，随着嗞嗞嗞的响声，锯断的竹片掉落下来。又让我拿来菜刀，他把锯断的竹片竖起，用刀把其分割成若干根比铅笔略粗的竹棍，不大一会儿，竹片便切成了一根根的竹棍，共20多根。父亲把我的哥哥、姐姐叫了过来，对我们说：“主体完工了，下一道工序是装修。”我不解其意，问：“爹，做筷子跟主体、装修有啥关系？”父亲说：“有啊，盖房子砌墙体和搭屋顶叫主体工程，剩下的抹灰油漆等叫装修，做筷子也一样，像我刚劈开的这些竹棍，有了筷子的大体形状，好比房子的主体完工了工。还要经过刮和磨，才能把它们做成筷子，这个过程如同房子的装修。我准备了玻璃片，咱们用它来刮筷子。我先给你们做示范。”父亲三句话不离本行，因为他在大同矿务局工程处工作，干过砌石工、组长，再后来是生产调度员，建造房屋是行家里手。

父亲从门后拎出一个小布袋，把里面的玻璃片倒在地上，其中还有一块砂布。他随即捡起一小块玻璃，左手拿着一根毛坯筷子，用锋利的玻璃刮筷子。只见那根小竹棍在他手中上下移动、来回旋转，刮下的竹屑纷纷落地。最后又用砂布反复打磨，不大一会儿，一根洁白光滑的筷子呈现在 我们面前，胜似出售的商品。父亲又说：“你们都看过了，就照这样做。不过，用玻璃刮时一定要小心，动作要轻，可不能伤着手。”随后我们人手一根竹棍、一块玻璃，动手“装修”筷子。大家很认真，很仔细而且乐此不疲。经过近一个小时的精心加工，竹棍全变成了筷子。哥哥姐姐和我的“产品”参差不齐，有的粗，有的细，有的很粗糙，与父亲做的一比较，差距就出来了。不过他还挺满意，说：“比我想象的要强。”

中午吃饭用上了新筷子，尽管仍是缺少油水的大烩菜和玉米面窝头，但感觉那味道比以前香甜了许多。

难忘时刻

1961年8月，厂部分配我到子弟中学任教。报到时，我诚惶诚恐，不知所措。学校杨校长是位中年妇女，她对我说：“欢迎你到学校工作，听说你学习好，爱读书，就到初二年级三班教语文兼班主任吧！”这个工作分配可让我睡不着觉了，辗转反侧，想自己不是学师范的，教课尚不知如何下手，还要当班主任，心中没底，真怕做不好。

第二天一上班我找了杨校长，说出了自己的担心，她笑了笑对我说：“一个年轻人这样谨慎小心，好吧，我找个人带带你吧！”说着就叫来了带我的人。我一看是位女老师，年龄似乎比我还小，个子不高，宽宽的额头，两只大眼睛，扎着两条长辫子。从介绍中知道她姓安，比我早两年来到中学，教数学课。领导一说，她就爽快答应了。安老师担任班主任，我当副班主任，我心里直犯嘀咕：她能行吗？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太原铁路局和太原化肥厂两大国企的三四百名职工子弟到清徐县王答大队插队落户。这么多年轻人聚集在一起，没有节假日，不分春夏秋冬——以往的农闲寒冬腊月也成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大忙时节。大家整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时日久了自然会感到有些乏味，甚至都快忘了自己也曾是有些文化和理想抱负的知识青年。

年轻人毕竟精力旺盛，总想着在劳作之余再干点什么。于是，知青中几个文学爱好者——平时爱激昂文字谄几首诗的好友便凑到一处开始做起了文学梦。大家商定十天半个月碰头一次。白天下地没空，晚上吃过饭后才有可能聚到一处，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小组活动的主要内容有几方面：一是闹扯交流各自的学习体会，二是办好各队的批判专栏、墙报，三是附庸风雅开展创作。

1974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全大队停电。文学小组成员摸黑从村东到村西聚到八队的知青伙房。灶台上煤油灯的光亮中，大家聊得兴致大发，有人提

议何不就此每人吟诗一首？尽管无人提出异议，但毕竟才疏学浅，大家你推我让，好一阵儿后才开始填作诗词。以后，聚会前大家各自完成“作业”，聚到一处便争相展示自己的文笔和天赋。

1974年，王答大队赶潮流办起了“五七农大”。知青文学小组在征得生产队干部的支持后，开始以大队团总支的名义创办了一份小报《虹光通讯》。通讯不定期出刊，八开粉连纸，每期两版，共印制百十来份，分发给全大队的年轻人。小报全部在腊纸上手刻，油印，报头“虹光”二字由公社一干部题写，文学小组成员共同撰稿，楷、隶、仿宋、黑体各种书写字体均由知青中的才女徐淑英完成，排版、发行也主要由她一人承担。

1975年1月13日，《虹光通讯》推出第七期。第二版选编的诗歌，引得大家争相讨论。有了这块文化阵地，村里的文学青年都可以在小报上赛诗比文了。一些较长的诗歌、散文、小说和小剧本等作品，文学小组就着手编出专门的分类集册《沃土新苗》文学刊物。

我当时也算是知青中的文艺青年，

尤其喜欢各地知青创作的诗歌和小说，也在偷偷搞创作。见到村里的油印小报，我试着将自己写的短篇小说投过去。虽说因版面所限无法刊登，但得到了小报主编的首肯。“五七农大”的白老师对小说中通过治理农作物病虫害的细节描写育人尤为赞赏。此后，我又试着写了《考试》等三四篇小说，并试着向县文化馆和省群众艺术馆投稿。粉碎“四人帮”后，我创作的小剧本《开闸》，经村中剧团排练，还参加了全县的文艺汇演，并荣获大奖。以后，企业开始招工。王答知青陆续返城，文学小组自然不复存在。国家恢复高考，我从村里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当了报社记者，直至出版长篇小说，算是圆了自己的文学梦。

王答知青中的其他文学青年，招工返城后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虽没有成就自己的梦想——当诗人成作家，但大多却由此走上了求知之路。有些人后来报考大学，当上了教师、医生和工程师；有些人对文学产生了终身的兴趣，直至退休有几位真还成了小有名气的诗人。



岁月留痕

## 记忆中的网兜

寇俊杰

不管何时，人们走亲访友时，带的物品总要用东西盛着。在我的记忆中，先是用竹篮、提包，后来用了一段时间的网兜，再后来就是各种塑料袋，虽然网兜用的时间并不长，但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塑料是舶来品，用塑料绳制成的网兜是我接触最早的塑料制品之一，它像渔网，张开很大，能盛很多东西，不用了收起来，可以装在口袋里，它很结实，颜色还很漂亮。刚开始，网兜就以它的轻便在社会迅速流行，商店里、集市上都有卖的，家家户户都有几个。那时人们上街或走亲访友，看着空手而出，不一定空手而归，因为他们口袋里有网兜呀。走在大街上，人们手里提的，自行车把上挂的，差不多都是五颜六色的网兜，大到一个西瓜，小到几个桃子，只要是口袋里装不下的，都装到网兜里。

我上小学用的是母亲缝制的书包，到初中得跑到外村上，这种花布头缝的书包没人用了，但那么多书呀、本呀、笔呀什么的，总不能手拿吧？这时正好有了网兜，这下可帮了大忙，笔放在文具盒里，和书本一起装进网兜里，手一提，或往肩上一背，成了那时中学生的标配。我那时正是叛逆期，偏激而固执，特别爱面子。有一次上学，我平时用的网兜可能因为装书多或用得久了，竟突然破了一个大洞。母亲找来家里的网兜，可我要么是嫌太小，要么是嫌太脏，试了几个都不满意。母亲让我先就将就用着，说路上也没人注意，等父亲回来让他到镇上给我买新的。我的倔脾气上来了，把书往地上一扔，赌气说不上学了。母亲没办法，只好跑了好几家，才借到了让我满意的。现在想想，我那时真是太不懂事了。

随着塑料制品越来越多，很快，更轻薄、更便宜的塑料袋不可阻挡地进入人们的生活，迅速取代了网兜，唯有一些关于网兜的记忆，让人久久怀念……

一件小事

## 三十年前“直播带货”

祝会敏

上世纪90年代初，我考上了一所中专学校。学校在40公里之外的邻县县城，为了省下饭费，我每周都骑自行车回家。途中会经过我们县城的食品批发市场。那时，方便面还是稀罕物。我买了一袋方便面，想期中考试那天犒劳一下自己。晚自习回了宿舍，我泡上方便面。不大工夫，香气四溢，隔壁宿舍的同学也被吸引来了。“这么香的面，下次帮我买两包。”“对，给我也带上三包。”场面热闹，像极了直播现场。

又到了返校的时间了，我特地早出发去帮同学们“捎货”，我算了一下，他们需要我带一箱零5袋方便面。热心的老板说我干脆买两箱算了，批发价一袋还不到4毛钱，而零售是5毛钱一袋。我算了一笔账，我每袋能挣一毛钱，算不算“奸商”呢？呀，也不算，毕竟那个时候谁也不会买整箱方便面，校外村子里的小卖铺也是卖5毛钱的。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多出来的多半箱面怎么办呀？对了，我可以上门推销呀！既能方便同学们，又不会占用我的生活费，早点“变现”呀。热心的老板帮我两箱方便面用绳子牢牢地捆到自行车上。

到了学校，预订方便面的同学都来找我拿货，顿时箱子瘪了，我的钱包鼓了。晚自习下课，顾不上洗漱便开始楼上楼下敲宿舍的门，问有没有需要方便面的。不到半个小时，多出来的那箱方便面也售罄了。

美滋滋地回到宿舍，竟然还有敲我们宿舍的门要求买方便面的。就这样我的方便面生意做起来了。那一段时间，我俨然成了一个出售方便面的小老板。一直到后来出现了商业对手，这个方便面的“直播带货”才宣告结束。

不过我可没闲着，后来我又从批发市场进了一批发卡，特别精美的那种。先让自己美美地戴上两天，有人问了，才拿出我批发来的发卡，这也算是一种“营销策略”吧，此后，我还将“带货”业务拓展到了校外，那是因为我学会了钩织拖鞋，还卖出去几双。

从方便面到发饰，从手工拖鞋到衣服鞋袜，记不清我在那三年带过多少次货，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锻炼了自己，拓宽了人际交往，最主要的是，减轻了家里的经济压力。

## 初登讲台

李汝骅

开学了，我第一次上课，站在教室门口紧张得手直发抖。班主任安老师先向同学们介绍了我。开始上课了，我不敢看同学们，只顾自己讲。我准备的内容，没有讲完下课铃声就响了。第二天上课时，我特意带上平时用的马蹄表，把表放在有边沿的讲台上，不时地看上一下，生怕上课时间不够用。我上课的一举一动都被安老师看到了。她课后笑着对我说：“今天下了晚自习后，我们在办公室把明天要上的课，互相试讲一下好吗？”她讲数学课，我才知道课堂上有几个环节，她讲解简明、板书条理、讲练结合，比我的满堂灌课堂效果好多了。我试讲语文课时，她告诉我要突出重点，要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

经过一段时间互相试讲，我感觉跟她学习了不少东西，进步挺快。后来她又推荐我到太原五中听了名师讲授的课文《雪

浪花》和《孔乙己》，我越发感受到课堂教学确实是一门艺术，需要钻研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有一天我快下课时，一个平时就挺调皮的学生从窗户爬出教室，下课铃响时，他又在教室门口喊报告要进教室，惹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我生气地把他带回办公室，他却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安老师知道情况后，心平气和地问他：“什么样的人进教室爬窗户而不走门口？”他说他着急要上厕所。安老师笑着说：“你知道我还带初三年级的课，要不叫你哥哥来回答这个问题。”他听后立即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走过来对我说：“李老师，我错了，以后再不这样闹了。”

我对安老师真心佩服，她帮我度过了初登讲台的窘境。在她的真诚帮助下，第二学期我就当了班主任，并聘请安老师做了我班少先队辅导员。